全球对话 6.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4期，以16种语言刊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气候变迁的政治

Herbert Docena

南非的暴力民主

Karl von Holdt

团结经济

Paul Singer

合作的出路
> Uralungal：印度最早成立的合作社
> Mondragon合作社：成功和挑战
> 希腊的反中盘商运动
> 阿根廷的自主企业
> 世界抑或资本主义的终结？

拉丁美洲的资本榨取主义
> 在拉美抗衡新榨取主义
> 厄瓜多的榨取主义vs. Buen Vivir
> 墨西哥对共有财的追求
> 阿根廷新的榨取主义

纪念
> VLADIMIR YADOV, 1929-2015

GD 第6卷/第1期/2016.3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 主编的话

环境和暴力民主

当科学家讨论气候变迁的时候，他们警告大众地球暖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洪水、台风、融化的冰川，以及小区的破坏。他们把注意力放到气候变迁的政治上面时，他们在意的是反暖化论者、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和运动的失败。但是精英之间的斗争却很少被注意到。过去 4 年来 Herbert Docena 一贯报导了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架构的运作情形，这次聚焦在最近期的巴黎会议 (2015/11/30-12/11)，他指出了精英之间的结盟变化，改革者放弃去说服保守团体的杯葛。然而他们也在激进派中去找寻潜在的盟友。总之会议结束后，没看到什么有太大的进展。

这期我们有 Karl von Holdt 的访谈，他是反种族隔离的社会学家，其对 Alf Nilsen 描述了他对于南非“暴力民主”的研究，并且也提出了对于其他形式暴力的解释。Maristella Svampa 和其他人解释了新的榨取经济如何毁坏拉丁美洲。大型矿产和石油，以及黄豆的开发计划透过中国的经济扩张而搭上便车，跨国公司对于利润的嗜血，以及需要资金的国家一起共同形塑。阿根廷、墨西哥、厄瓜多的例子说明了这些计划怎么和想要保护土地、水、空气的社会抗争交手。

我们也刊载了 6 篇关于印度、希腊、西班牙、阿根廷的 6 篇文章，看看合作经济的生存和代价。合作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吗？或是像 Leslie Sklair 所说的资本主义下的兼容物？毫无疑问的是，Paul Singer 是合作经济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家，他是巴西政府的团结经济部长。像是访谈中所说的，他不是什么合作经济的先知，对他来说这只是解决贫穷问题的方法。

最后，我们有 5 篇对于 Vladimir Yadov 的纪念文章。他于去年过世，是俄罗斯社会学的先驱，在共产主义下巧妙地推动社会学。Yadov 仍然是后苏联社会学辩论的重要人物。透过了解这位国际主义者、ISA 副会长 (1990-94) 的一生，我们看到学生、同事如何爱戴和纪念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

这期开始 Juan Piovani 会负责西班牙文的翻译，接手 María José Álvarez 之前的工作。我们欢迎 Juan，并且感谢 Majo 和其团队之前的努力与贡献。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Herbert Docena是气候变迁会议的长期观察者，分析了巴黎高峰会的全球精英政治结盟的变迁。

Karl von Holdt是学者也是社运者，提供了南非政治的分析。

Paul Singer是学者、政治人物、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描述了其巴西团结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GD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赞助。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Saeed Nowrooz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Shuhei Matsuo, Yutaro Shimokawa, Masaki Yokota.

哈萨克: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Shuhei Matsuo, Yutaro Shimokawa, Masaki Yokota.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Ewa Cichocka, Mariusz Finkielsztein,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ła, Justyna Kościńska, Martyna Maciuch,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ąc, Adam Mü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 a Penza,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Roxana Alionte, Costinel Anuța,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Adelina Moroșanu, Rareș-Mihai Mușat, Marian Valentin Năstase, Oana-Elena Negrea, Daniel Popa, Diana Tihan,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Carmen Voinea.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气候与暴力民主 2

气候变迁的政治
by Herbert Docena，美国 4

南非的暴力民主：访谈Karl von Holdt
by Alf Nilsen，挪威 7

> 合作的出路

团结经济：访谈Paul Singer
by Gustavo Taniguti and Renan Dias de Oliveira，巴西 11

Uralungal：印度最早成立的合作社
by Michelle Williams，南非 14

Mondragon合作社：成功和挑战
by Sharryn Kasmir，美国 16

希腊的反中盘商运动
by Theodoros Rakopoulos，挪威 18

阿根廷的自主企业
by Julián Rebón，阿根廷 20

世界抑或资本主义的终结？
by Leslie Sklair，英国 22

> 拉丁美洲的资本榨取主义

在拉美抗衡新榨取主义
by Maristella Svampa，阿根廷 24

厄瓜多的榨取主义vs. Buen Vivir
by William Sacher and Michelle Báez，厄瓜多 26

墨西哥对共有财的追求
by Mina Lorena Navarro，墨西哥 28

阿根廷新的榨取主义
by Marian Sola Álvarez，阿根廷 30

> 纪念VLADIMIR YADOV，1929-2015

贡献给开放社会学的一生
by Mikhail Chernysh，俄罗斯 32

学者与人道主义者
by Andrei Alekseev，俄罗斯 34

导师、同事、朋友
by Tatyana Protasenko，俄罗斯 36

个人怀想
by Valentina Uzunova，俄罗斯 38

苏维埃和后苏维埃的社会学代表人物
by Gevorg Poghosyan，亚美尼亚 39

> 气候变迁的政治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ISA劳工运动委员会(RC44)委员

巴黎气候变迁会议场外的抗议。Herbert Docena摄影。

对于一些参与气候正义运动的人来说，战线是在联合国气候变迁高峰会的会议大厦高墙。高墙外面有来自各国的“运动”和“人民”，在街道上高喊“要系统变迁，不要气候变迁”。高墙里面，各国代表和企业代表则努力要维持系统不变。所以，社运老将 Rebecca Solnit 在高峰会的前夕写说，要区分“会场外的人”和“会场内的人”。她建议是前者“才有权力改变世界”。

在场内和场外的战线上，对于观察气候变迁的政治，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也模糊掉了变迁和复杂的战线变化，不论场外场内都是。因为，若我们只看到场内要胜过场外这种间单的二分方式，那是不够的。

> 会议室里的斗争

许多这些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专家等人，以及坐在会议室里面的人，也的确被动员去保护系统。他们捍卫国家的竞争性和利益，反对管制全球资本主义，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仅仅是“绿化”而已。

但是不是所有的掌权者都是短视近利的人。的确，从 1970 和 80 年开始，世界精英的其中一个特殊团体已经开始动员要“改变系统”，但是，为的是不伤害资本主义。这些精英开始结盟，要全球管制，或是改革、妥协，至少管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和对抗

>>

全球暖化，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让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组织者等有多数追随者的人当道。

在提出“系统保留的系统变迁”中，这些改革精英，以及那些想要吸引中下阶级的计划也开始让更保守的精英，要去反组织和抵挡那些改革和让步。从 1980 年代开始，改革者之间的罅隙就开始越来越深了。

面对更组织化的保守势力反扑，有些我们称之为民粹改革者的人，像是环境保护基金会 (EDF)，Fredd Krupp 或是 Al Gore，还有其他许多官员、企业家、基金会、专家、甚至运动者认为，唯有和精英结盟，那么改革的计划才得以可能。为了结盟，他们开始在国内和国际的管制方式上下功夫，因为保守派会吃这一套。国际上，他们开始支持国际协议，让排放量更低，并给予一点弹性，像是碳交易或是市场机制，然后让他们从责任中解脱，并且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财务和科技转移。

当这些让步没办法让保守派满足的时候，他们倡议要更多的让步，推动由下而上的 2009 哥本哈根协议，可是，那基本上是保守派在 1990 所达成的协议版本，只有一点点更动而已。

但是，其他场内的人而且总是渐渐成为这种策略的怀疑论者。来自开发或开发中国家进步派的官员、基金会、环境组织等对于迟迟没有办法改变系统感到沮丧，并且开始认为只有牺牲改革者的计划，不和保守派结盟，要和草根社运联合，那才有希望。

在一个 2010 年的公开信中，1 Sky 的执行长（后来的 350.org)Bill McKibben 说：

我们需要加倍我们对于草根运动的投入，我强烈认为长期对草根组织的投资不足，将会让我们裹足不前。当然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办到的事，这需要好几年的深入、耐心，投入时间和资源。

这种论述已经在改革圈之中越来越普及了。在一个广泛传开的 2013 年由 Rockefeller 基金会所委托的研究中指出了，为什么环境运动者一直想办法通过其计划案，研究者 Theda Skocpol 响应了 McKibben 和其他场内政治批评者所言，建议要培力“更广泛参与的行动”。

> 街头上的改革者

和这些策略一致的是，从 2000 年后期开始，民粹改革者已经加倍投资到草根运动中了，他们透过更努力的参与、更注意、花更多资源在动员那些团体上面达到其目的。

想要赢过其他的团体，这些改革者就必须不能对激进派的主张有所让步。所以，虽然他们不一定反对市场管制的方式，McKibben 或是其他绿色和平之类的环境组织支持更直接的非市场管制，管制石化工业生产。这是一个“让石油、煤、天然气永远在地下”的一个方案。

总地来说，他们呼吁要更勇敢、更有野心的国际共识，要减少更多的排放量，特别是对于已开发国家，对碳交易更要求严格。结果，他们反对 2009 的“由下而上”哥本哈根协议，并且比其他改革者对于类似的协议采取更批判的立场。

但是，这样宏大的抱负或是管制没办法透过“联盟”或是“游说”而达成目标，他们已经和温和改革派决裂了，转向其他组织，像是学生、工人、农村、或是被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人们，为的是要去采取更针对性的反资本和反政府行动。

虽然他自己逃避了反资本主义的位置，Mckibben 邀请了知名的反 新自由主义作者和长期对抗资本主义的行动者加入 350.org 的委员会，在地的行动者则支持小区的抗争，包括煤矿发电和其他的能源计划，这不只在全球北方，还包括了菲律宾。

Exxon 资助“气候怀疑论者”。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左派组织了大量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在高峰会的最后一天与其他改革团体在街上表达抗议。

但是，当他们想要比其他改革者更进一步推动激进改革、联合其他团体、有更激烈的动作的时候，其他民粹改革者要从反企业和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线上退守，所以当 McKibben 和其盟友在“人民审判”中谴责 Exxon 的时候，他们却不想要人民审判中提到 Exxon 或是其他所有曾经贡献给“气候变

>>

迁”的企业和政府。

相似地，350.org 的成员在巴黎高峰会的时候帮忙发起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可是其他的组织者很明显地告诉参加者说那些他们会面对的敌人是国家和资本家，而他们代表了 Arc de Triomphe 和 La Défense 的商业领域，而 350.org 宣传的资料也建议了这个原则，就是敌人是石化厂商，是“大资本家”。而同时间，也就是行动日，不足够的人数和不足的资金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和抗议者举办了自己的小型会议，说“x 的资本主义！”，而比较有资源的 350.org 则有巨大的 2x200 公尺的旗帜，写着“抗议气候罪行”和“让其在地下就好”，这两者让其他的标语都看起来很小，包括了中间前面的“要系统变迁，不要气候变迁”。

> 分裂的街道上

改革者的努力和企图让我们更注意到了反对保守精英的行动，这种无法改变系统的行动只让原本的改革派更加分裂而已。当保守派把简单的改革挡下，而那些改革是有可以改变现状的，加上民粹改革派又坚持那些改革，那么激进派之间就分裂了。所以，有些人已经选择和改革派形成联盟，或是联合民粹派，为的就是让那些被保守派挡下的改革方案可以更进一步推行而已。他们已经强调的改革的论述，呼应气候变迁是资本主义缺乏管制所导致。意思就是只要管制就可以改变现状。而“敌人”主要是石化企业，“坏资本家”，和“坏精英”。其他人则反对联盟，坚持彻底的结构性系统变迁。在不忽略改革者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坚持要超越改革的论述，然后宣称资本的缺乏管制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所导致。增加管制虽然或许有成效，但是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必须要连根拔除。这样一来，敌人较包括了“好资本家”和“好精英”，就是那些为了想要保持现状而想要“改变系统”的人。

所以战线不是只在，也不会只在联合国气候变迁高峰会的“场内”和“场外”。他们会在场外与场内都相遇得到。至于是否街头上的社运者或是会议室里开会的人会赢得这场胜利，那取决于谁在街头上会胜过对方了。

来信寄给 Herbert Docena <herbertdocena@gmail.com>

> 南非的暴力民主：

访谈Karl von Holdt

1993年，Karl von Holdt 参加ANC联盟的游行，当时正值南非的民主转型。William Matlala摄影。

Karl von Holdt 长期献身于政治与学术，也曾是 South African Labor Bulletin 的主编，而那时的劳动是南非社会运动的主要议题。他也为南非工会大会的政策部门 (COSATU) NALEDI 工作，和担任 COSATU 的工会展望委员会的主席 (1996-7)，近年是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代表。他也是位于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大学社会工作与发展员院的院长。此外，他也有许多著作，像是 Transition From Below: Forging Trade Unionism and Workplace Change in South Africa，这是南非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书之一。他也和 Michael Burawoy 着有 Conversations with Bourdieu: The Johannesburg Moment (2012)。现在其研究包括了国家制度的功能、集体暴力、结社活动。他也是 ISA 的劳动运动研究委员会的委员 (RC44)。这个访谈由 Alf Gunvald Nilsen 所完成，另一个较长版本的访谈可以在挪威社会学学会的通讯上找到。

>>

当南非在1994从种族隔离走向民主制度的时候，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似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希望无限。“从这持续了那么久的人类苦难经验中，”总统曼德拉这么说，“必须诞生一个荣耀光明的社会。”而20多年来，南非的社会现实则比曼德拉说的还要复杂，尽管新的政治上自由化了，但是恶化的种族不平等、贫穷等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在这个“彩虹的民族”，歧义是被不平等所深化的，并且产生了排外主义，排斥移民。而社会学家又要怎么复杂且矛盾的现象？

〉南非的暴力民主

Karl Von Holdt

“这里有许多的矛盾和疑惑。”von Holdt这么说。von Holdt是Witwatersrand大学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主任和副教授。von Holdt不仅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发声，也是从一个同时跨足学术和社运的观点来阐述。

von Holdt承认种族隔离取消的重要性，“我们住在这种世界，一种种族宰制、压迫、制度化的暴力体系，并且被剥夺权力。这些现在都不见了。”同时，一种不可见的排除建构似乎持续着。对于von Holdt来说，若要说这个社会没什么变，那是错的。相反的是，南非的社会变迁很难用简单的概念来解释。“政治和社会学上来说，许多概念主导了解释国家运作和社会秩序组织的论述，这从西方现代性中孕生而来。当我们透过这些概念看看自己，很容易去说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的社会太暴力了。可是，我相信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不论是去看概念怎么从西方现代性中传承下来，或是去看南非脉络下这些概念的适用性，都是如此。”

这个企图想要从不同观点看事情的努力让von Holdt去描述南非是一个暴力的民主国度。暴力和民主不是相互排斥的，这从欧洲的国家诞生历史和南非的当代经验中可以得证。“在欧洲的脉络下，我们很容易去把现代性看成是好几世纪的、安抚人民的过程，然后建立处理冲突的和平管道。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全球的角度来看，就会看到这个过程和殖民征服与宰制是紧密结合的，并且是整合到欧洲的发展里面。在南非的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就是非常暴力的过程，我们已经经历这种暴力有四百年了！”

对于von Holdt来说，今天暴力是和南非重要的变迁紧密结合的，特别是黑人精英的形成，透过斗争国家而产生。他认为南非的政治“镶嵌了社会经济和人权，但是也保护的财产权。现在财产权的分配是被360年来的殖民宰制和隔离所形塑的，而且变得更加极化。”因为宪法限制了系统性的重分配，国家扮演了重分配中很重要的角色。“国家目前是南非最大的雇主，也拥有很大的预算，巨大的资源都被掌控在这里，对于这些资源的取得于是对于精英形成来说至关重大。”他说，“若想要取得权力，那就要有侍从主义的支持者、联盟、网络，取得这些资源逝去建立政治资本的方式。相反地，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你要有政治连带，这么一来，财富和政治是绑在一起的。权力斗争预设了暴力的特质，因为不同的阵营是会要去削弱对方的。这是为什么南非的民主是暴力的。”

南非的暴力民主也透过贫穷小区的抗争而显现出来。这样的抗争通常是对于公共服务的不满而来，也都被描述成穷人的抵抗的自主表述。但是von Holdt认为，那些抗议是从“精英那里诞生出来的，透过侍从主义的组织，资源取得，然后在穷人之间展开网络。”当von Holdt和一群研究员调查Mpumalanga和Gauteng的抗议事件时，他说“我们了解到在领袖和ANC网络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那些领导者就是地方ANC的成员，主要是要去得ANC在地方上的权力。”然而，von Holdt并不支持穷人被简单操弄的论点，“他们有愤怒，那是真实的，如果在地的政治领袖想要成为精英，他们要会抓到地方人民愤怒的点，而这么一来，穷人也是在利用领导者去取得发声的机会，取得资源。侍从主义不总是很简单地被精英所决定，穷人也扮演者一定的角色。”

在南非的政治地景变迁相当明显，包括了从2012年8 月16日之后的变化，当警察杀死了34名Marikana罢工的矿工工人之后更是明显。这是南非暴力民主的最好代表，也就是Marikana屠杀。这开启了组织的断裂，削弱了ANC对于国家工会的掌控。在2014年，社运的进步联盟，联合前线，就试图要去更新左派政治，而ANC分离出去

>>

2014年，社会学家Karl von Holdt在一个地方的会议，叫做Trouble。William Matlala摄影。

的激进民族主义和重分配组织，经济自由斗士，也动摇了 ANC 的基础。“ANC 的霸权正在腐蚀，”von Holdt 这么说，可是也警告说“未来还很不确定，尽管看到霸权的动摇，ANC 仍然宰制着地方小区，还很有影响力。”

> 布迪厄，法农，和暴力的社会学

Von Holdt 对于南非社会暴力民主的诊断是，其把暴力用更普世的角度去概念化的努力密切相关的。在 Current Sociology 期刊里的一篇文章，他探讨了高层次暴力和南非抗争政治的关联，并引用他和 Michael Burawoy 合着的文章 Conversations with Bourdieu: The Johannesburg Moment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2)。“我对这本书的贡献，”von Holdt 说，“是在于试图透过南非去阅读布迪厄，去标示出其贡献中的漏洞和忽略，因为他的作品对于秩序的再生产有了很好的解释。”

在这个文章里面，von Holdt 探讨了在布迪厄的象征暴力和法农的殖民暴力里面的协调与不协调之处。“殖民处境里面，象征暴力并不是如布迪厄所称的那样运作的，只解释秩序是不够的。法农说真正的暴力也是必须的，但是同时象征暴力也帮助我们去理解法农所说的种族主义和殖民秩序的暴力不仅仅是物理和物质的，同时也是象征性的。”

“这两位理论家有趣的是法农和殖民和后殖民的作品之中，暴力和现代性是携手并行的，现代性本身就是暴力的。但是布迪厄如果忽略他研究阿尔及立亚的背景，则完全就是从一个西方社会走出来的理论家。我觉得有趣的是回到布迪厄，然后问西方现代性是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子。我有点怀疑，特别是在现在西方危机的脉落下，他的预设将会难以成立。在广泛失业的浪潮下，象征暴力要怎么展开？国家要取消所有的福利吗？银行或企业是宰制的吗？我看都不成立吧。”

这些作品整合了 Jean 和 John Comaroff 的论述，也就是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来观察现代世界？Von Holdt 持怀疑的态度，“我有点怀疑，因为北方总是试图要保持自己的例外主义。”而根本的议题仍然是北方要怎么去宰制知识生产和财富榨取。宰制关系不会取代，这是说好像南方会宰制世纪，“而是有些分析的洞见和概念的

>>

创新含盖了一种对于北方理论体系的反思，包括其对于北方现实的关系。”

这和 Raewyn Connell 对于南方理论的呼吁是平行的吗？“我会这么想，就是在那方做理论，而非南方理论。我觉得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已经这么西方了，那要怎么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这又从哪里来？”而南非社会学已经从那些和世界体系核心有密切关系的人和语言那里发展出来，对于知识生产已经影响很大了。“我们是那些白人占领者的后代，所以我们从那里开始。我们很西方知识紧密的结合，可是其他人可能也探索了原住民的思想，这有可能会激荡出重要的火花。”

南非后种族隔离的暴力社会学

从西方社会学的限制开始，我们的对话转向了公共社会学的挑战，这个脉络是在南非冲突矛盾的后种族隔离时代下所展开的。Von Holdt 的一生在学术和社运之间来回，坚持公共社会学不可以是纯粹的反对运动。“进步的社会学家总是想象自己和弱势阶层运动站在同一阵线。那是一种进步社会学分析的特权，然后透过如此可以产生政治影响力。”Von Holdt 的研究对象是 SWOP，就是在这个脉络下成立的，也在 1980 年代长期和 COSATU 对话，但是民主转型之后，SWOP 开始和进步的政府部门合作，这个经验让 von Holdt 去质问了公共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分野与界线。“政策社会学被认为一桩生意，你接受付款去生产出分析结果，当你和工会合作，那研究的出发都是批判，但是一天下来，工会也会希望有政策相关知识，因为他们要用来协商。他们需要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案本身就是政策问题。对我来说，公共社会学是一种纯粹的制式形式，可是政策社会学相反，被认为有点受到污染。我不认为这种看法行得通。反抗的社会和政治的社会是要存在着互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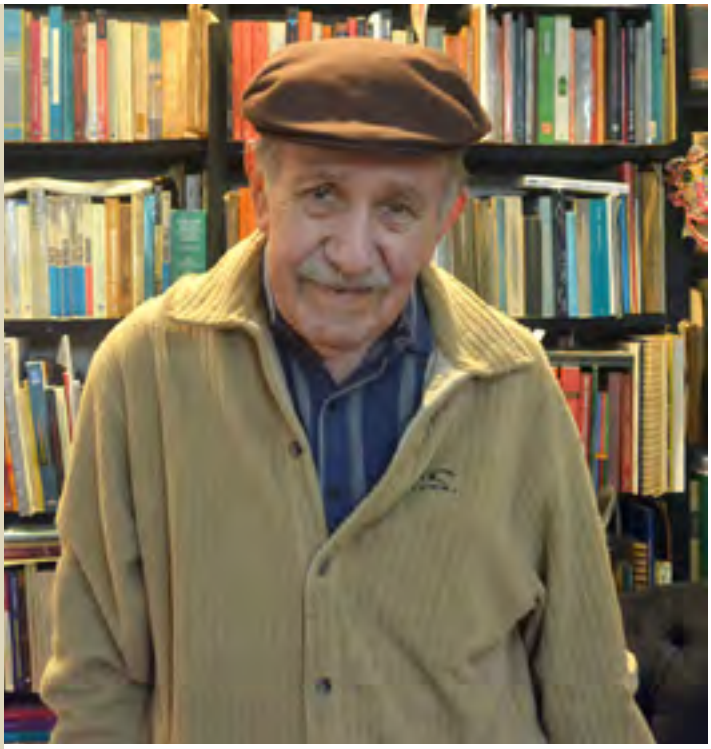
在今日的南非，对权力说真话变得更加必要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似乎又要再次前进了，因为我们工会的实践和原则现在已经不是用了，而且新的分裂也产生了。旧的规则不适用了，那我们公共社会学的实践就要有所进步。”可是对于 von Holdt 来说，这并不代表一定要有一个跟之前完全不同的公共社会学。“不论你想要产生影响力，或是抗拒，或是改造社会，你都是在和权力妥协。而那是让人不安的。有些人对于站在批判的一方感到比较自在。然而，概念的创造力是必须和现实做出一番搏斗的，那肯定是永远充满挑战。”

来信寄给 Alf Gunvald Nilson <alfgunvald@gmail.com>
和 Karl von Holdt <karl@yeoville.org.za>

>团结经济

访问Paul Singer

Paul Singer是巴西团结经济的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包括了Desenvolvimento e Crise［发展和危机］(1968),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e Evolução Urbana［经济发展和都市革命］(1969), Dinâmica Populacional e Desenvolvimento［人口动态和发展］(1970), Dominação e desigualdade: estrutura de classes e repartição de renda no Brasil［宰制和不平等：巴西的阶级结构和收入分配］(1981) and Introdução à Economia Solidária［团结经济导论］(2002)。他在奥地利的Vienna出生，然后1940年搬到巴西。1953年时他21岁，成为São Paulo的钢铁工人工会的战斗成员，领导了一个历史有名的，为期一个月的大罢工。1960年他结合了其工会和知识活动，开始在São Paulo大学教书，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并同时在Princeton大学研读人口学。后来他的政治权利被独裁政府剥夺，于是协助成立一个知名的智库Centro Brasileiro de Análise e Planejamento (CEBRAP)。回到学校后，Singer也帮忙成立了工党(PT)，成为São Paulo的计划部部长，后来则又担任国家团结经济部长。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和团结经济的经验，以及这样的计划怎么贡献给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巴西São Paulo大学博士后研究员Gustavo Taniguti和Fundação Santo André的教授Re-



Paul Singer.

GT&RO： 在1969年你和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Octávio Ianni, José Arthur Giannotti, Juarez Brandão Lopes和Francisco de Oliveira成立了Centro Brasileiro Análise e Planejamento (CEBRAP)。这是批判知识分子的群体，诞生在军政府最压迫的时期。其对于开始讨论巴西贫穷问题的重要性何在？

PS：我从事贫穷的研究，那时，是因为我都说我们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真正问题就是贫穷，而我们却不知道到另外一面，也就是富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量不平等，我们没有取得所有资源的管道。那时，我会说：

>>

巴西真的问题是排除，而排除是贫穷的结果。

GT&RO：在1979年，好几年政治迫害之后，你回到的学术界，之前是被军政府强迫退休。在1980年你参加了工党的成立运作，那时，什么让团结经济的议题开始被讨论的？你有参与吗？

PS：没人在CEBRAP真正联络了团结经济。我想这是一个未知的议题。后来，我发现团结经济是被天主教会所激发产生的。团结经济一词是被智利经济学家Luiz Razeto所创。他写作许多相关的书，他现在退休了，但是仍然出版许多著作。而工党在80年代的成立也和团结经济无关。我的兴趣主要从个人权利出发，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对于实存社会主义一夕之间消失的印象很深，很快的柏林围墙倒塌，政治体制也崩蹋了。工党内，社会主义的崩溃带起了意识形态的危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想要在巴西建立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所以我花了很多力气去把“民主社会主义”带进来。

1990年代巴西面临的巨大的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就业体系。6千万的工作不见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因为那之前，巴西没有这样的失业危机。后来百万的劳工就没有工作了，没有房子、没有收入。这是真正的社会悲剧。因为如此，我邀请教会来看看巴西的合作社。Caritas被认为是天主教会的改革者，创造了1000个合作社，主要是失业者组成。我发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答案：就是项合作社，没有失业、没主管、没阶级。所有事情都是集体决定的，很平等。我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Folha de S.Paulo报纸，包括了所谓的“团结经济：一个对抗失业的武器”。我没有创造这个运动，我只是发现了而已。

GT&RO：在那个脉络下，你对于团结经济的理论是什么方向？

PS：我会说主要的参考坐标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并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开始。这很有趣，因为我以前喜欢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卢森堡、还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我在São Paulo教的课的其中一门中，学生要我说更多关于这些著作，所以我开始读Robert Owen的作品，我认为那很棒，于是成为我的参考点。

GT&RO：你后来成为了São Paulo的计划部长，那时市长是Mayor LuizaErundina (1989-1993)。那时的反贫穷计划和团结经济有关吗？若有，怎么有关？

PS：一开始没有，但是后来是的。São Paulo是一个拉美最大的都市，是一个广大且不平等的都会，而市政府那时是第一个左翼政府，第一个女市长。此外，Luiza Erundina从贫穷的家庭而来，北巴西的Paraíba而来，她加入了工党，变成领袖。当然其政府任内，贫穷是主要目标，因为我们要去解决1980的危机。我记得市长、工会、和我自己辩论怎么降低失业率。后来Lula说工会无法支持失业者，但是也不知怎么办。这样来说，工会就无法支持合作社成员。这是客观。雇主是为了减税，但这不可能，因为会让基本社会福利的预算缩减，像是教育或是健康。

所以在这个脉络下很难。第一，我们开启了一个任务团体去执行第一个无住屋人民的人口普查，为的是让他们免除饥饿。后来，我们创造了可回收物品合作社，这是团结经济的开始。透过从Caritas我们发现了团结经济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决定采用合作主义的百分之百精神，1996年之前我深信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

GT&RO：在2000年，两个重要的辩论团结经济的场域被开启了：巴西团结经济论坛(Fórum Brasileiro de Economia Solidária)和团结经济的全国部门，也是团结经济部的分支(Secretaria Nacional de Economia Solidária)。你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成立的政治脉络吗？他们怎么在国家、都市的层次帮助的团结经济的运作？

PS：脉络是高的失业率，虽然说没有比1980时代还高。Cardoso的政府是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对抗通膨，他透过降息解决，可是导致高失业率。这让工人的议价能力减弱了。

当Lula在2002年当选的时候，他已经确定团结经济会被纳入政策之中。工党也采用了团结经济，并且仍然在政纲之中。当

>>

Lula 开始其总统任期开始之后，团结经济运动开始有了全国会议，推动劳动就业部的诞生。这发展得很快，2003 年在 Lula 就任后更是如此。我们花了几个月从他那里得到授权，在 6 月团结经济部诞生了，因为我们不会在没有社会运动的情况下去制定政策。那不合理。于是，论坛就是让政策制定在社会运动中被讨论，并实况报导团结经济的问题、宣称、需求。

今天的团结经济涵盖了全国，从亚马逊到南方。这规模还不够大，但是也不小。除了团结经济部，相通法律也开启了国家的委员会，许多的成员都是从论坛而来。

而劳动部也用这个预算去推动和帮助团结经济。我们在 Rousseff 的第一任特别推动，加入了 Brasil sem Miséria 计划。5 到 6 个部门是计划一员，而团结经济部负责都市地区，把合作社机会带过去，我们估计是这个政策帮助了 50 万的家庭脱贫，但我们不是第一个推动制定的国家，法国才是。2001 年第一个社会论坛中，我们和法国的团结经济部长见了面。

GT&RO：你可以解释这个大学为主的组织创业计划是怎么运作的吗？

PS：这个摇篮是从美国开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刺激了学生和教授去在校园里面组织公司。而他们运作地非常好。Rio de Janeiro 的联邦大学有团结经济的第一个创业计划，那是 1994 年。我们的则不同，我们不是科学的创业，主要是社会议题。在几年之后，我们到了合作社在 Rio 展开了，而现在巴西和许多公共学校也有自己的创业计划，这是被部门所支持的。现在巴西的大学里面有 110 个类似的组织，这些创业组织也对于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学生从各地而来，经济学、地理、社会科学、工程。但是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是第一次去帮助穷人，这教育意义很大。

GT&RO：从你的观点说，什么是工会主导经济组织的最大好处？巴西团结经济目前的挑战又是什么？

PS：我会说最大的优点是民主。人们一起工作、尊重彼此，没有竞争。团结经济显示了在巴西我们有大 30000 的合作社，包括上百万人。我们也从其他地方来的支持，像是天主教会、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 (CUT)，还有大学。这是非常新的经验。

在那些对于巴西团结经济的挑战来说，最重要的是团结经济有点脆弱。许多在 5 年内就消失了，而总体来说，小型企业寿命较短。可是，当然不是所有小型企业都是如此。例如：我们有恢复生产工厂 (Fábricas Recuperadas)。当一个破产的工厂被合作社所取代接管了，就是恢复生产工厂。巴西有 67 间，阿根廷或其他拉美国家也有很多。

GT&RO：你怎么看比较巴西的团结经济和拉美或是其他国家的经验？

PS：我也还在学习团结经济，每天还是持续吸收新知。地方的层次来说，处理企业的脆弱性是一大挑战，而文化也很重要。内部的冲突和争议也对于企业的成败很重要。我们必须知道怎么去避免冲突，还有化解冲突。我不太确定团结经济对于世界来说重要性为何，但是和其他的国家，像是南非、菲律宾、南韩、或是欧洲、拉美等比较起来，很重要的是建立民主的工作环境。我们必须从中学习。

来信寄给 Gustavo Taniguti

<gustavotaniguti@gmail.com>

> Uralungal,

印度最早成立的劳工合作社

by Michell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劳工运动委员会委员(RC44)

Uralungal的施工场景。那是印度最早的工人合作社。

在印度的Kerala有一个重要的合作社，它让主流的预测跌破了眼镜90多年了。Uralungal劳工合作社(ULCCS)是一个有2000人的劳工自主拥有的合作社，建造大的基础设施，像是道路、桥梁、建筑物等。其名字是以北方Kerala的Malabar的Uralungal村庄为名，并且是地方替代生产模式的先驱，代表了团结经济的许多特质，像是民主、平等、团结、互惠、整合网络。这些原则镶嵌在合作的文化之中，透过工人、法律，制定出合作的目标，确保安全、奖赏、好的工资的劳动。这些目标是需要民主工作环境、组织、平等重分配来配合的，甚至在高竞争的环境下胜过那些大型、追求高获利（通常腐败）的承包商。

ULCSS对于民主和平等原则的承诺，其追溯到刚成立初期的几年。在20世纪初期的30和40年代，Uralungal是政治暴动的核心，有权力的农民和工人运动在Malabar兴起，民族主义运动有激进的转向，而共产党也兴起成为了一种霸权。在合作社成立初期，形塑了一种替代经济的风气，这是奠基在民主决策和贡献给社会的剩余价值，以及生态永续、集体生产等价值上。几年下来，合作社用自己的民主组织、集体决策、替代文化去克服了每项挑战。

主流的经济学家总是预测，即使工人合作产生了，生存下来了，然后茁壮了，他们会很快的转变成资本主义工厂，失去其崇高的工人控管和产权的目标。这是错的，事实上工人的表现代表了一种经验上的启发，提供了未来实践的无价的宝贵课程。

在ULCSS的成功经验

>>

的中心是其对于参与的承诺，还有直接民主的保证。接下来我会阐述参与民主的这个面向。

决策制定和工人民主

合作社是如何在没有资本主义技术的规训与诱因之下，去确定严谨的工作协调和有效率的生产？他们又要怎么确保工人的产权没有侵蚀管理者的权力，或是工人会不偷懒呢？更具体而言，ULCCS怎么在阶层和参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看看ULCCS的经验，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的效率与参与层面。

在ULCCS，工人在年度会议的时候选出理事会主席，然后讨论报告的细节，回顾去年的状况。这个年度会议不是徒具形式而已，而理事会的选举也不是预先决定的。一旦理事会选出来后，他们就有自主性去洽商合约、选择科技、分配工人，然后还包括其他日常事项。因此，理事是合作社的管理团队，意味着管理阶层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这和资本主义企业是相反的，因为在那些公司里面，管理者是被指派的。

施工场地是透过领班去领导的，这些领班是从工人之中选出一过程选出那些具有管理能力的工人。然后，该领导是被尊重和信任的。工人和领班继续讨论分工和施工程序，例如，在集体的午餐（透过合作社准备）的时候讨论。虽然审议是很包容的，但是一旦决定了事情，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若是违反领班的指令，玩忽职守，财务出错，表现不佳，那会有所惩处。不过这是很少见的。

民主程序透过规律的沟通而达到合作的目的。工作场域的领导者要出席每日会议，所有的领班、理事会成员、技术人员都要参加每周会议，而所有工人都要参加每月会议，而新的进度要报告，然后工人可以提出批评。全部的财务报告都要通过年度会议讨论。虽然许多的会议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也产生了一种集体产权、团结、共同目标的文化，有利于提高生产力。

参与和市场竞争

ULCCS的主要挑战在于和私人承包商的竞争，因为合作社不能以缩减工人福利或是偷工减料来削价竞争。而合作社总是考虑合约的细节原则，这得到了很大的声誉。从印度的公共工人计划的恶名昭彰的腐败经验来看，证明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合作社的竞争优势是从高劳动生产力而来的，并且从有效率的科技使用和劳工的勤奋与技巧而来，这是劳动密集建构过程的重要资产。举例而言，一般柏油石子路的质量成本取决于不同层的厚度，红土结合的效率，柏油混合的平均度，以及适时的金属层的加入。每一步骤都需要工人的技术，勤奋、承诺。此外，工人也会有动机去维护一个适合的工作排程，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这对于合作社的成功准时完成一项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工人的技术和承诺，并不简单的只是管理员或是经理，都是合作社的主要资产。ULCCS已经以主动参与决策制定为优先考虑，同时也维护弹性的排程和好的工作环境。

机械化已经改变了工作的场域，而许多的工作，包括建造业，已经变成不必要的，去技术化的。此外，在连结到机械化的步伐变化上，也有可能变成工人对于团结感的理解，在知道政治危险的前提下，合作已经被深化的民主所响应，并且是透过三种方式，包括深度的承诺给透明、公开审议，重新评估工人建议回馈的重要性，以及改善其技术发展的计划。

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在临时工间承诺的减少。以前许多的会员都还是创始世代的亲戚，但是现在有许多的工人并没有亲戚和地方上的连结。许多的参与者担心在年度会议上审议的质量，以及工人在周末要加班的意外。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只有继续的教育合作社的历史，承诺和奉献的传统，以及让ULCCS变成今日这般规模的原则。因此，ULCCS作为纯粹的合作社的存在是政治的，其必须产生合作的价值，在资本宰制的社会中突显其重要性。■

來信寄給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 Mondragon合作社：成功和挑战

by Sharryn Kasmir, Hofstra University, 美国

Mondragon旗舰企业的破产。大型电器Fagor的制造机。

在金融危机后期和反撙节运动风起云涌的期间，在美国和欧洲兴起了一股对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团结经济的兴趣：学术界或是社运界认为工人拥有的合作社可以保住工作，给工人更多的劳动控制权，并鼓励团结。他们也认为这样的转变是社会主义的种子，或至少是民主的或是公平的资本主义。这在几十年后的新自由主义侵袭之后，可说是个好消息！

在西班牙的 Basque 的 Mondragon 一般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工人自主合作社工厂。其在 1950 年的天主教行动计划中开始的，今天的 Mondragon 包括了 257 个金融、工业、零售、研发、发展的部门，雇用了 74,000 名员工。其制造很多东西，包括商业厨房设备 (Fagor 品牌)，工业自动机。旗下的 Eroski 零售品牌在欧洲有 2000 个店面，而银行 Caja Laboral 和社会安全合作社提供了资金上的协助。合作社没有工会，也没有外部投资者。然而，每个劳工都是投资者，也都有投票权。每个合作社成员都是合作社大会的代表，在大会里面做出重要决策。

规模和成功让 Mondragon 成为合作社实验的一个特例，而且有很多地方的确值得效法尊敬。合作社保留了金融危机期间在西班牙 Basque 的成员的工作，增加了团结感，成员也接受减薪，做额外的投资，并且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合作社之间转移。Mondragon 限制管理阶层的最高薪资要在最低新的 9 倍之内，而西班牙的总体比率则是 127:1。Mondragon 的核心原则是劳动自主，而非资本主导，这在把剩余产值分配给劳工时明显看得出来，劳工的账户在 Caja Laboral，那里有劳工私人账户，并且可以做投资。

虽然，Mondragon 通常是我们所想要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另类模式的起点，一些对于合作社中的一般劳工、劳动条件等重要的问题通常都被忽视了。

合作社劳工集中在 Basque，但是 Mon-

>>

dragon 在 1990 年代走向了国际化。现在则有 100 间子工厂，多数在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工资低和新兴市场。这些工厂不是工人拥有的，而劳工也没有享有那些合作社劳工所有的权利。那些劳工仅仅是薪资劳工而已。即使在 Basque 和西班牙，工厂和零售的合作社雇用了大量的临时工和短期顾约劳动。今天，只有大约二分之一的 Mondragon 的事业是合作社型态，三分之一的员工是合作社成员。

2013 年，Fagor Electrodomésticos（家用电器部门）宣布破产，这是一个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的牺牲者，也动摇了西班牙房地产市场和家用电器业。Mondragon 补助 Fagor 好几年，但是在 6 个国家的 18 个工厂的投资是很大的负担，要一直到 Mondragon 合作社不继续补助之后才减轻其负担。这个破产威胁了 5,600 个工作（从泡沫化之前的 11,000 个下降）。

当人口超过 25,000 人之后，Mondragón 城市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Fagor 成员

在波兰的 Wroclaw，2008 年的抗议低薪罢工和反工会镇压带出了对于 Fagor 的三层劳动力的问题，就是合作社成员在 Basque，临时工在西班牙，薪资劳动在子工厂。这意谓着 Basque 的工作保障、薪资水平、民主参与是透过剥削其他地方的劳动力吗？

一个对于在中国的 Mondragon 子工厂的研究中，比较了合作社的工厂和外国资本家的工厂，发现工资很低，工时长，环境差。而且就像那些资本主义厂，Mondragon 在中国投资的工厂也在生产劳力密集的产品，这可是合作社成员投票赞成的策略。

而这些子工厂可以转换成合作社吗？虽然 2003 年的合作社大会呼吁“社会扩张”，扩张民主参与，可是国家的法律架构让这件事情很难达成。Mondragon 的非营利组织希望可以强化全球社会经济网络，帮助美国的联合钢铁工人组织可以发展出有工会的合作社，并且和 Pittsburgh 的最近发展出来的商业洗衣厂合作。可是 Mondragon 的子工厂仍然像标准化的工厂，尽管他们这么做不是要最大化股东的利益，而是要保留合作社和工作。

许多的学者相信 Mondragon 对待非会员的劳工很好，认为他们努力教育在墨西哥的劳工和在西班牙 Galicia 的接受资本主义工厂的合作社成员。其他则认为 Mondragon 的全球策略证明了合作社不能在资本主义中存活，因为面对竞争，合作社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工厂。

然而，这些问题有更大的历史脉络。在 1980 年代晚期，我发现了工厂里面的状况，一般工人参与决策的情形，还有工人的认同等，这些都没有比邻近有工会的资本主义工厂来的要好。此外，合作社成员对于 Basque 运动并没有太大的团结感。Basque 是那时候的一个左派社运联盟。Mondragon 作为一个组织，在政治中风暴中没有迷失，而合作社成原则保住工作，但是，在地的金属制造业工人就选择了罢工。

Mondragon 或许会成为非资本主义的避风港，但是，这样的经验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学习机会，特别是当我们把工人，包括工会成员、契约工人、薪资劳工，和劳工阶级运动放在中心的话，更是如此。以建立劳动和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说，什么是合作社的角色呢？而 Mondragon 的平等主义又如何强化更大了政治视野？ Mondragon 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让我们去思考非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宝贵的案例，让我们思考阶级和权力之间关系等的艰难问题。

來信寄給 Sharryn Kasmir <sharryn.m.kasmir@hofstra.edu>

> 希腊的反中盘商运动

by Theodoros Rakopoulos, University of Bergen, 挪威

在Thessaloniki的玉蜀黍市场。

合作社通常是一种对于经济危机的草根式响应，而在希腊这种情形已经6年了，它提供了工人安全网，保住工作。这现象也发生从1930年的美国经济萧条开始，到1990年东欧的后会主义困境，一直到2001的阿根廷危机。当希腊面对了持续的萧条，随着失业率从2015年的27%开始，一系列的动员就助长了高度政治化的非正式合作社网络。这也影响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安排和政治领域。遍布希腊的草根团体用一种新的激进化方式蔓延开来，并透过建构一种互惠的社会经济，称作“团结”或是“替代”经济，因此而得以可能。

在过去5年来，这种非正式草根运动的网络是和希腊左派日渐升高的知名度有关的，而且也和Syriza这个激进左派联盟的兴起相关。只是，这种相关也对运动带来了困局，就是Syriza的选举胜利和最近要接受新的撙节政策，让团结经济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 行动的时刻

围绕在非正式合作社而形成的这些实验，像是以物易物，或是时间银行等，以及合作社所组织的社会福利服务，像是社会诊所和药局，这些都为撙节提供了替代方案。工人或下层中产阶级在希腊的城市已经经验过了非正式合作社化了，特别在2011和2014年更是如此。

在Thessaloniki（希腊的第二大城），许多该城市中心或是郊区的居民都得利于“反中盘商”运动。不支薪的参与者要协调草根合作社去分配食物，帮忙农产品提供者去贩卖产品，直接销售给顾客，并且采用开放农业市集的方式。2012-2013年，希腊有将近80个这样的组织。于运动的高峰期，在Thessaloniki就可以看到每个星期日都要这样的市集，千余人会参加。

这个反中盘商的运动是透过非正式合作社所组织起来的。都市的运动者在穷的或是中产阶级小区组织农人，找场地，市场，停车位等等。这些市集是为了抵制中盘商而设的。运动者联络附近的农人，邀请他们到市集，这样就形成了长期的关系。运动者会用一种规律，但非正式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农人用将近一半的价格贩卖新鲜的产品给人们。这些关系则透过要求农人不要投票给新纳粹政党Golden Dawn或是不要支持种族主义政策而得以正式化。

>>

>冬眠的时刻

今天，许多在地的家庭的基本需求，是透过这种非正式的农业分配。可是，在2013年高峰之后，该运动就起起落落。许多反中盘商的组织现在都在冬眠了，也越来越少开会，甚至不活动了。

反中盘商运动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友善的脉络。合作社主义分子要面对政治的迫害，无法得到市场摆摊的许可，而有些农民则因为“在公共场所非法摆摊”而被罚钱，这是一个Thessaloniki开放市场组织，是中盘商的游说团体。个人精力的消耗也是重点之一，许多人因此无法在运动中担任领导角色。

第二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运动人士对于非正式运作是否会保证活力的关心一直有表达出来。许多运动者讨论了合作社化，但是，这也需要一个进步的政治和法律架构才行。

当然，这样的努力会得到进步政府的支持的。在2015年1月，也就是Syriza掌权的前几个月前，该运动开始进入了冬眠阶段。面对国家强制介入和无法完全让农人进入运动之中的困境，运动人士转向希望有更好的结构条件支持“团结经济”。他们期待政党轮替，也转去支非正式合作社。有些人则担心“收编”的情形，可是多数的团结经济社运人士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气候，“一旦左派执政，那就太好了”一位运动人士这么说。事实上，许多的会议中都讨论“我们正在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而一对领导运动人士则建议“运动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很简单地动员农民。”当Syriza的成员开始加入（或是“渗透”，像是一位运动者开玩笑地跟我说的一样）的时候，大家很清楚知道Syriza会带领走向“团结经济新时代”。

>Syriza掌权

该政党为了选举，成立了一个伞形组织，为的是去强化其底下的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方式让团结经济取得了国际知名度，呼应了Syriza的受欢迎程度。可是该党的政纲并没有在草根层次去针对运动的发展。反而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社运人士在复杂的情境中变成了和Syriza结盟，也有人选择退出运动圈。

同时，食物团结经济已经逐渐地消失了，不论数量和吸引立上都是如此。许多原本的草根团体现在都摇摇欲坠了，在“被收编”和“固体化”之间摆荡。有些运动人士是这样描述这个运动在拥抱国家中的部份转型的：“anathesi”，可以大概被翻译成让渡。而其实践则是让渡的政治，反应了草根运动可以让渡其能量和潜力给政治场域，然后自己则是慢慢消失。

矛盾的是，合作社社会经济已经和进步的激进左翼政府有所结合，可是掌权的Syriza却被证明了是团结经济发展的意外的绊脚石，这个现实是在党和非正式团体之间展开的，更重要的是，大家期待的其实是左翼会支持团结经济才对（一月的选举口号是“希望将至”）。

政治动员是团结运动的血脉，而今已经远去了。不过反中盘商运动的足迹至今还是在Thessaloniki的民间或是政治场域中清晰可见。社会诊所和药房仍然活跃，而由反中盘商运动建立起了合作社食品店依然相当成功。同时，Syriza在中止撙节中的绝望般的失败—该党引介的新的纾困和撙节方案—已经让许多团结经济支持者对于制度左翼感到去正当性化了，或许更加深了草根团体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在新的撙节政策的到来前夕，政府不会有空间去制定一个新的法律架构来被背书和推动合作社和团结经济。而这样的变化会如运动分子所言，“会从物质需要和心灵张力中快速窜出”吗？我想我们还是要去看是否这些新的动态可能会重新活化了团结运动或是重塑了参与者和左翼制度政治之间不太调和的关系。■

來信寄給 Theodoros Rakopoulos <trakopoulos@gmail.com>

注1：这篇文章的田野由Wenner-Gren基金会赞助。基金会赞助号码为 8856。

> 阿根廷的恢复生产企业

by Julián Rebón,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Zanon水提供场在2001年被工人接管。这是阿根廷最大的恢复生产工厂之一。

那是 2014 年 8 月 11 日的早晨，在 Buenos Aires 的 Garín 区。400 名工人在 Donnelley Graphic 工厂门口找到了一张通知，说这个跨国公司已经关掉了阿根廷的分公司了。工人聚集，商讨对策。作为一个合作的集体，他们后来决定恢复生产。

这些工人依靠的是自从 2000 年开始就在阿根廷超过 300 间工厂所发展出来的策略：恢复生产。这体现了合作主义的主要贡献：民主、自主结社、集体产权。这些开创了一种更民主的企业。

工人开始恢复生产的文化始于 1990 年代，特别是 2001 年的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经济停滞，但是，阿根廷的危机从这些恢复生产的工厂中得利，主要两个原因。第一，许多关闭或是倒闭的工厂带来了许多失业和不稳定就业。第二，这些政治危机导致了许多社会反抗运动的诞生，这是一个工人恢复生产文化出现的脉络。对于一个有工作文化的社会来说，抗议失业变成了一种广泛有正当性的行动。(1)

当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出现时，许多学者认为恢复生产企业会消失，但这还没有发生，而下面的数据显示了虽然新的恢复生产工厂数量在 2002 年到达的高峰，但是，在经济回稳和失业率下降时，这还是继续有的。工人有新的社会组织方法，持续在新的脉络中实现。虽然失业率下降，但还是显著(7%)，而且政治情势不欢迎这种文化，然而，这还是扩张开来了。

恢复生产的企业似乎就是一直经营下去了。按照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的 Programa Facultad Abierta 所统计，311 个恢复生产工厂雇用了 13,642 名的工人，这是 2013 年的阿根廷数据。虽然半数是在

>>

Buenos Aires 都会区，21/24 个区域有恢复生产工厂。多数很小、或是中型，生产金属、布料、食物等等。

来源：作者对资料的分析。 Programa Facultad Abierta,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恢复生产工厂已经开始开创新的就业机会，只有少数关闭。然而，他们也面对了挑战。例如，现有的法律对于那些占领工厂的工人视为自主工人，没有退休金、健保、家庭福利。工人合作社要求政府重组管理阶层，让那些工人享有社会福利。但是，工人自主的工厂也面对了法律怎么定位那些生产器具的难题。工人倚赖地方的公共使用法律去得到法律地位，但是有些地方，工人是无法有产权的，所以很不一定。

2011 年，破产法或是 Ley de Concursos y Quiebras 被附加到破产的案例上，在合作社里组织的工人或许使用劳动信用 (acreencias laborales) 去买下破产的工厂，可是，这个法律并不适用到所有案例。定义不清的财产权底下，工人的风险是很大的。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警察正好驱逐了 La Robla 恢复生产旅馆的占领工人，而在 Bauen 的工人也面对了驱逐的命运。虽然社会上，恢复生产工厂是被接受的，但是法律上仍未被允许。

來信寄給 Julián Rebón <julianrebon@gmail.com>

>世界抑或资本主义的末日？

by Leslie Sklai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英国

Abu绘。

“要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要简单多了”大家早已这么说，这是一项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争的事实。有更多作品早已谈论资本主义如何邪恶了，但是较少的人在谈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会是怎么样，而这样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的脉络下更是如此。我的论证是，我们最好把进步的变迁看成是长期的一种否定、避免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过程，加上社会民主，还有现有的国家形式。

而为什么资本主义注定没办法为人类带来繁荣、幸福和平呢？资本主义两个注定的缺点包括了阶级分化的危机（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中产阶级越来越不安全），以及生态的非永续性（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还有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型态）。而危机可以归因给跨国资本阶级（企业、政治、专业、消费），和其价值体系，以及消费主义。（注 1）

这里，我简单地想指出几个进步的非资本主义转型。第一是规模。大规模的转型企业与企业国家是由大批的专业和消费产品与服务所支撑的，这主宰了所有人的生活，所以很明显的是小规模结构或许可以运作得更好，让人们可以活出自己的生命。这不是什么地方主义的幻想。我的想法是另类、激进、进步的全球化视野，是一种小型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PCC）所构筑成的网络，在各种层级上展开，主要是确定所有人类可以有尊严的活着。

而 PCC 是怎么组织起来，并且在非资本主义世界释放出全球化解放的能量呢？一个简单并且鼓舞人心的答案就是：那真的是可行的，至少在转型的早期可行，并且无数的小规模合作社在现在世界也正在形成运作中。本期论坛的其他文章也论及了启发人的

>>

故事，以及进步的行动主义，可是，不太意外的是，那些主张其实都有问题。

Sharryn Kasmir 说明曾经是很壮大的 Mondragon 合作社运动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妥协。

Michelle Williams 的个和研究 Uralungal LabourContract Cooperative Society in Kerala 则论证了工人控制的必要情况，但结论却是未来是不安全的。在 Paul Singer 的访谈中，我们看到巴西的团结经济如何开展，把人民带离贫穷，可是，却不知道社会整体如何改变。

Julián Rebón 的分析则是以阿根廷工人自主工厂为主，问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更容易生存，像是 Theodoros Rakopoulos 对于希腊反中盘商运动的研究，指出了 Syriza 的左派占领国家看起来像是抑制而非支持整个运动。

这些之中没有一个指出，一个资本主义剥削或是生态浩劫的出路，也没有一个问题化国家的角色，不论左派、右派、中间派都是如此。此外，也没有说这些怎么和资本主义消费市场抗衡，我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会变成阶层化，而只有 PCC 这种小规模组织，不论全球或是地方，可以透过网络，避免造成许多问题。

Gramsci 在他的《狱中札记》中说，在危机的时代，老的死去，新的还未到来。虽然 Gramsci 把注意放在 1930 年代的危机情况，可是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所以我想要聚焦在资本主义危机尚未到来的情境中。

那些行动方案的可行性试图要避免和市场竞争，闪躲阶层化国家，但是许多预设是未经检验的。第一个预设就是那些每日例行工作是可以继续的，并且在 PCC 的架构下是优于大型企业的，现在许多人不论是在公部门或是私部门都已经组成了自己的 PCC，像是在地食物、交通、学习训练、健康照顾等等的合作社。PCC 已经在全世界展开，并且在小型规模上建立起来了许多行动方案，并与资本市场共存。小区支持的农业也迈开了第一步，这努力虽然困难，但是值得。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没有替代方案，但若是我们拒绝相信并且开始行动，那当然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许多读者开始微笑相信，但却觉得难以置信。一百年前器官移植也没人相信可能发生，或是登陆月球，或是飞机的交通等等，这些都难以置信。所以我们要相信像是社会世界论坛说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社会学对于这件事情默不作声，这是很罕见的。即使这么做会有威胁，并且受到韦伯价值无关的那些学者嘲笑，但是不惊讶的，研究所和提供资金者基本上很抗拒。而讽刺的是有大量的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可是，却没有质问资本主义本身，或是讨论非资本主义社会。就连进步左派 E.O. Wright 在《想象乌托邦》中也有类似的结论。

但是，就时间上来说已经成熟可以发展出一个激进、进步的社会学的，并且开始去面对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或是研究的挑战。这包括了挑战成长主义的教条，挑战资本全球化、社会民主、教条马克思主义。这些已经在共生去成长这个概念中讨论过了，意味着富者会不那么富有，贫者会变得比较富有。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型态将会被人权和责任取代，开创一个永续的世界。

只有借着忽略市场，我们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可逃避的灾难性后果。这听起来很不切实际，但是若我们无法承认阿基利斯的脚踝是有弱点的，也就是全球消费资本主义的弱点：消费者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但是消费者不能暴露在垃圾食物、饮料、文化等等之中。资本主义市场、广告、意识形态、企业国家架构难以抵挡，但是若是家长可以了解到市场怎么损害他们和后代，那么就还有希望。虽然这资本主义要终结是很困难的，我们活得越久，事情就越复杂，但是我们要开始想象另一个世界。■

來信寄給 Leslie Sklair <l.sklair@lse.ac.uk>

註 1：我已經對此有論述了，見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2001) 和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拉丁美洲的新榨取主义的积累

by Maristella Svamp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Mapuche抗议采矿。

穿越整个拉美，运动者和知识分子正在质问着资本积累和发展的模式，辩论像是榨取主义，buen vivir，或是美好生活的权利、共善、自然权利等等的概念。他们也关心永续发展。这些论述都建议了一种社会、经济、自然的可能关系。这些辩论也都非常激烈，像是在厄瓜多和玻利维亚，因为21世纪民选的政府已经似乎要追求另一种发展模式了。

但是这些辩论已经越来越复杂。当政府已经扩张了自然资源的剥削时，新榨取主义的批判开始成形了。“新榨取主义”指向了以剥削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积累，并且成为了政治和社会、原住民、农民运动中的关键词。特点是其把主要商品大量的出口，透过大型投资，对于生态造成伤害。新榨取主义包括了表面采矿、石油气开采、水坝兴建、扩张捕鱼和砍伐森林，以及商业化农业（黄豆、石油、生质原料）。

我把这种现阶段的资本积累称作“商品共识”(Svampa, 2011, 2013)。这和1990的时候不一样，现在拉美的经济被国际商品价格所拉高，政府也重视这个利基，刻意忽略不平等的现状，也忽略环境、经济、社会等由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不对称。许多国家采取生产主义模式，不管负面的声浪和抗议。

商品共识把重点放在区域的大规模的回归到主要的开采榨取活动上，中国恶化此一情况，因为是拉美的主要消费者。2013年中国是智利和巴西的主要出口国，也是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的第二大出口国家。

>>

商品共识的阶段

商品共识已经历经许多阶段。起源是在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的时候，那时产生了拉美的转型，不论社会或经济都是，而拉美国家都偏好跨国公司和制定新法律去允许开采榨取活动，包括矿产、石油、基改作物。

1990年代后期，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在玻利维亚、厄瓜多、阿根廷等国家蔓延开来。但是后来出现进步的政府却面临了严峻的限制和冲突。当国际价格在2003年飙高时，商品共识开始结合了高获利和相对优势。这个第一阶段是由和开采榨取活动带来的冲突压制有关，许多政府发展了新的组织，和私人跨国公司合作。尽管民族主义的修辞存在着，过去十年来开采计划增加了，而大的跨国公司则摇身成为一国的经济命脉。

从2009到2010年，第二阶段是以近一步的榨取扩张为特征。在巴西的例子我们看到成长加速计划在亚马逊要建造多个水坝。在玻利维亚，工业大跃进（gran salto industrial）承诺了多种的榨取计划（天然气、锂、铁、商业化农业）。在厄瓜多则是以大型采矿为主。委内瑞拉的Strategic Plan则会扩张石油开采，进入到奥里诺科重油带。阿根廷的农产食物Strategic Plan从2010到2020预估要有60%的黄豆产量、石油气、矿产等的成长。

大型采矿也导致了社会环境的紧张。按照拉丁美州的矿产冲突观察计划所显示的，总共在2010年120起冲突，150的小区受到影响。2012年有161起冲突，包括了173个开采计划，212个小区，然而2014年有冲突增加到198起，包括了207个计划和296个小区。2015年4月以前，有208起的冲突，218的计划和312个小区受到波及。墨西哥是最高比例的，有36起冲突，秘鲁则次之，35起。智利34起，阿根廷26起，巴西20起，哥伦比亚13起，玻利维亚9起，厄瓜多7起。(http://www.conflictosmineros.net/)

在现阶段，社会环境和土地的斗争超越了地方的政治格局，受到了全国的瞩目。这包括了保护玻利维亚的Isiboro Sécure国家公园与原住民领土（TIPNIS），那里的在地人口反对公路的兴建。还有反对在巴西Belo Monte的大坝兴建，反对阿根廷的大型采矿，还有厄瓜多的Yasuní-ITT计划以及Intag的军事化。无论在新自由主义或是保守政府的国家也都看到这些抗议。在秘鲁，反对Conga的采矿计划运动在2011和2013年引起了25人死亡。墨西哥的抗议采矿和水坝运动则继续，尽管压迫和暴力仍然持续之中。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支持榨取主义，并且入罪和打压那些抗议活动，限制人民的政治参与。资本对于自然资源、土地、货物等的扩张和剥削已经让集体、环境的权利受到侵害，并粉碎了那些解放和带来希望的的论述，像是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就是如此。在论述和实践之间日益增加的差距代表了民主的倒退。这是从进步或是民主政治倒退到传统的威权体制，诉诸以往的民粹或是国家发展主义。■

來信寄給 Maristella Svampa
<maristellasvampa@yahoo.com>

References

Slipak, A. (2014) "Un análisis del ascenso de China y sus vínculos con América Latina a la luz de la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Realidad Económica 282: 99-124.

Svampa, M. (2011) "Modelo de Desarrollo y cuestión ambiental en América Latina: categorías y escenarios en disputa," in F. Wanderley (ed.) El desarrollo en cuestión. Reflexiones desde América Latina. La Paz: CIDES, OXFAM and Plural.

---------- (2013) "Consenso de los Commodities y lenguajes de valo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in Nueva Sociedad 244, www.nuso.org.

> 榨取主义 vs. Buen Vivir

厄瓜多

by William Sacher 和Michelle Báez, FLACSO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 厄瓜多

建造Mirador表面开采铜矿的矿场于Tundayme, Zamora-Chinchipe, 厄瓜多。Omar Ordoñez摄影。

2007年，总统Rafael Correa开启了一个大的区域和国际的政治计划，叫做“公民的革命”(La Revolución Ciudadana)。在2008年，一个宪法集会批准了新的宪法，赋予环境权利。2009年，政府的第一个发展计划：Plan Nacional para el Buen Vivir（国家好生活计划）实行了，翻转的发展主义的典范，承认了那些“在南部正在进行中的榨取主义。”此外，先行的Yasuní-ITT计划要求亚马逊地带的石油开采要停止，承诺要进入到后榨取的厄瓜多时代。而在所谓的公民革命之后的7年，Correa的政策对于采矿的石油产生了什么影想？又留下了什么？

> 榨取主义的扩张

在过去几年，总统Correa已经扩张榨取的规模了。在石油地区，新的让步开展了多于3百万亩的亚马逊土地去进行钻井。2013年，厄瓜多放弃了ITT计划，意味着

>>

Yasuní National Park 开放开采，那里可是许多原住民家。类似的还有 2009 年，政府开始支持各种开采大型计划，许多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的，目的是去转变厄瓜多成为采矿国家。今天，许多的铜和金矿采集计划持续着，并且都在敏感的原住民区、生物多样区、还有水园区。

最重要的是，那些采矿公司是跨国的：智利的国有公司 Codelco，其在 Inta 区域拥有 Llurimagua 计划。加拿大新公司像是 Lundin Mining, Cornerstone, 和 Dynasty Metals, 都继续执行其开采计划，并且受到加拿大法律天堂的保护。而中国的国有公司 Tongling 和 China Railways 也是。尽管建立了 ENAMI (Empresa Nacional Minera) 公司，厄瓜多对于矿产并没有控制能力。

在石油区域，新的政府成功地增加了税收，这是透过和石油公司的协商和国有公司的加入而得以可能。然而，新的开采地带多数是给国外公司的。此外，很重要的是，厄瓜多过去 5 年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银行的 10 亿贷款，这导致了厄瓜多石油的开采会继续分裂下去，因为这个贷款是要用石油偿还给中国公司的。所以，今日有 90% 的石油产收是用来还债的。

> 透过驱逐而积累

在石油和矿产地带，那些大公司和国家政府部门使用法律的架构去驱逐当地的居民，把机器从中型矿产公司那里征收走，然后建立物质的基础给榨取主义。

这些过程，很明显的是 David Harvey 的“驱逐然后积累”，也导致了无数的反榨取主义的社会运动。那些运动深怕未来的环境和灾难，就像过去亚马逊地带的厄瓜多一样，会层出不穷。这些运动包括了农民，原住民，像是 Sarayaku 和 Shuar 以及 Mestizo 人 (Cordillera del Condor)。也包括在 Intag 和 Pacto 的居民，páramo 地带的人，要求对于开发 Yasuní National Park 要进行公投的 Yasunidos 都市人。该公投还没有被厄瓜多国会批准。

> 边缘化、压迫、社会运动的罪行化

政府已经忽略对于榨取的批评声音很久了。在总统 Correa 的星期六广播 (Sabatinas，政府传媒）中已经听到政府把反对声音视为“幼稚”，并把榨取美化成“发展”和“进步”。

刑法已经被用来定罪那些反对人士（特别是透过“恐怖主义”或是“破坏主义”来污名那些人）。其他的法律工具，像是 código 16，已经被用来关闭像是 Pachamama 的 NGO，该组织是在亚马逊区反对石油公司的。

最后，于矿区和石油区增加的警察和军队已经在当地社会造成了恐惧，还造成多起死亡。军警威胁用来恫吓让那些反对声音，使得对于榨取的公共辩论变得不可行。

我们在另外的文章 (Sacher, 2010) 中把那些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国家称之为“采矿国家”或是“石油国家”。随着 Revolución Ciudadana 政治计划的实行，厄瓜多政府现在开启了一种新的物质和社会模式，是用来发展用的。过去数年，Rafael Correa 已经把厄瓜多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变成的采矿和石油国家。

> Buen Vivir 留下了什么？

Correa 的政府采取了榨取主义政策，这是和他们的官方修辞是不同的。官方谴责发展主义的经济成长模式，反对剥削，也要求终结榨取。可是政府的真正作为违反了 2008 年的宪法精神。政府认为采矿和石油公司将会执行“负责”的自然资源开采以及榨取主义必须户被取代。可是厄瓜多的哲学家 David Cortez 已经说过，Correa 的 Sumak Kawsay (Buen Vivir) 已经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工具，甚至是一种新的权力策略。■

來信寄給 William Sacher <william.sacher@mail.mcgill.ca>
和 Michelle Báez <baemic@gmail.com>

References

Sacher, W. “The Canadian mineable pattern: institutionalized plundering and impunity.” Acta Sociológica 54, January-April 2010, pp. 49-67.

> 在墨西哥对共有财的斗争

by Mina Lorena Navarro,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墨西哥

墨西哥Santiago河中的死鱼。

过去15年间，在墨西哥兴起了反对Maristella svampa的环境斗争，称为“Commodity Consensus”。这是对于取用、控制、管理共同自然资源的冲突，而核心是榨取主义，因为他商品化了社会财富，好进行资本积累，这包括了三个过程。

• 新的工业化农业发展和国际食物场域，排除了小的农村生产者和农业经济。

• 公路、港口、机场、铁路、观光客等的大型计划，有利于榨取主义。

• 社会的分裂，由于主义的基础建设计划和都市扩张等，这威胁了那些受保护的区域。

这些变迁已经被国内或国际的资本还有政府组织所激化，司法策略包括了收买、惩罚、分裂社群等，并且进行剥削和市场开

>>

发。接着，追求共善的运动却受到暴力的对待与威胁。墨西哥环境法律中心（CDMA）报导了 44 名环境运动者被杀害的事件，这发生在 2005 和 2013 之间。大概在同一个时期还有 16 个犯罪行为，14 项非法使用武力，64 个非法拘禁。尽管这些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反对运动还是继续出现，主要是由那些原住民或是农人所领导。农业社群已经策略性的抵制水坝的兴建，因为那会威胁到那个区域。而在 Guerrero，Ejidos 小区的议会（CECOP）因为其 12 年的对于 Parota 水坝的阻止，素富盛名。

在同样的时间，大概过去 15 年，墨西哥政府已经给出了 24,000 允许去进行表面采矿和石油气开采。而该地区的基因改造食品也是另一项问题，成了农民和原住民的反抗。这些运动的抗争得到了初步的结果，就是企业种植基改玉米必须先停止，另外一个努力对准了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要去减少运输的成本。墨西哥 Atenco 和 Estado 的保护土地计划反对墨西哥新的机场。观光客计划则威胁了农人和渔夫的生习惯。对于 CaboPulmo 的斗争已经成为了象征上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原本的计划对于生活多样性，限制那些大型开发案的进行。

像是墨西哥市或是 Puelba 之类的城市，许许多多的社会运动试图去防止基础建设计划，特别是那些农业区或是保护区。许多区域被表面掩埋的毒物和污染的水源所影响，包括了 23,000 居民，他门现在组成了对抗 Grupo México 的联合阵线。此外，也有爆炸或是外泄在 PEMEX 的运作榨取下发生。PEMEX 是国家的石油公司。

即使共同体并没有在保护领土上总是取得胜利，但他们已经可以拖延，或是甚至停止那些大型开发计划了。透过集体的自我组织和自主政府，这些都成为可能。例如，在 Michoacán 的 Cherán 的原住民小区已经开始去限制雨林的破坏，保卫自己的小区。

毫无疑问地，这些斗争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以及可保护人类和非人类的另外一条道路。对共善的追求有两个目标。首先，就是要把政治权力重新夺回，重新形塑我们的个群。其次是，对于自主象征和物质再生产的能力，共善的维护和重新生产是人类存活的基本，但是我们的社群是否会被允许管制取得和使用那些共善，那就是当代文明化的基本问题了。

來信寄給 Mina Navarro < mina.navarro.t@gmail.com>

References

Navarro, M. L. (2015) Luchas por lo común. Antagonismo social contra el despojo capitalista de los bienes naturales en México. Mexico: ICSyH BUAP/ bajo tierra ediciones.

Svampa, M. (2013) “Consenso de los ‘Commodities’ y lenguajes de valo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in Nueva Sociedad, 244.

> 阿根廷的新榨取主义

by Marian Sola Álvarez,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阿根廷

Mendoza的抗议采矿。

阿根廷是一个榨取主义扩张的好例子，像是农业企业、大规模采矿、还有最近的石油气开采。这也导致了许多反对运动的诞生。

当农业企业出现，以及其成为农业模型的时候，阿根廷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成为了基改黄豆的主要生产者。价格的上涨也让黄豆种植的土地面积由 1996 年的 370,000 公亩成长到 2014-2015 年的 2 千零 50 万公亩。虽然大规模的黄豆和玉米的生产是用来出口，让土地集中在外资手上，而农业还是被视为是传统的国家产业，这种看法大大限制了辩论这种产业和生产方式的空间。

可是，许多的反对行动也出现了。民间的团体在“停止熏蒸”(Paren de Fumigar) 的口号下集结，谴责那些导致土地被熏蒸的行为。许多团体组织了抗议，抗议黄豆为主的农业模式，也批评对土地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而农民和原住民社群也已经试图去制止这种方式，要求实施国家森林法。

1990 年代开始采矿变得越来越相关。在 2000 年之前，地上表面采矿在阿根廷有了指数性的成长。金属矿产，特别是金和铜，都变成了阿根廷的第二快速成长的出口，第一是黄豆。按照国家采矿部的统计，矿产出口成长了 434%，而采矿计划成长了 3,311%。地方政府也提供许多采矿的优惠措施。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鼓励了大型矿产的榨取模式，只有在 2007 年有少数的变化。这个国家的法律架构已经在鼓励新的榨取剥削模式，并套过“法律安全”和高获利来达成。阿根廷的中央政府和 1994 年的宪法修正案让这些计划在得到地方土地上有所法律根据。结果就是大型采矿必须要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加上大财团等经济行动者，还有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动态有所配合。

有组织对于新的采矿计划的反抗和影响在阿根廷传播开来了。许多的运动出现了，多数是由“自我组成的结社”(asambleas de autoconvocados) 所开展。可是，这些群体可以发声的机会有限，因为政府会管制和污名化这些抗议行动。还有这些团体也很难取得公共资源。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不只

>>

帮助增加了黄豆的产量和大规模采矿的计划，并且也开启了一条路，让石油气开采可以放行。虽然这种试验性的技术已经被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所采用，但是政府却扩张了这种产业版图，透过国有公司 YPF 的运作达成。这是有效的行动，因为国家企业可以承诺能源自给自足的目标。

在 2013 年，一份在 YPF、Chevron 和 Neuquén 省之间的协议标示了阿根廷大规模开采石油气的开始。而那时候起，在 Vaca Muerta 的页岩储存量和反石油气开采的人士所被被贴上的污名标签一样，能够容许反对意见的空见缩小许多。然而，反抗的声浪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在 Patagonia 省，因为那里的社运组织与原住民团体从事保护土地和水源的运动由来已久。在许多其他省份，像是 Buenos Aires 和 Entre Ríos，其地方法律也都禁止进一步的天然资源开采。

新型榨取开采环境资源的模式和大规模集中的水力和核能发电厂有关，也和大规模的农业、矿业、天然气等的所需的基础建设计划有关。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对于商品化和剥削自然资源有利的，也促成了霸权的形成，让跨国公司可以有权力改变土地。

当我们质问这种新的剥削模式的时候，我们面对了多重的挑战，可是这也是机会去辩论我们想要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尽管有着不平等，大家对于辩论的参与也都深深影响了人类、社会、土地、环境的权利，这也对于民主的社会，至关重大。

來信寄給 Marian Sola Álvarez
<mariansoal@yahoo.com.ar>

> 贡献给 开放社会学的一生

by Mikhail Chernysh,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Moscow, 俄罗斯, ISA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委员(RC47)和人权与社会正义主题小组成员(TG03)

Vladimir Yadov.

Vladimir Yadov 是二次战前的世代的学者。他在列宁格勒出生，那是一个充满勇气、牺牲、悲剧、斯大林斗争、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历史的城市。那是创意精神的地方，连结到的名字包括了 Akhmatova，Shostakovich 和 Brodsky。

1945 年 Yadov 还是 16 岁的时候，梦想要成为飞行员。当这位年轻高中生注册飞行员军校之后，却发现不合格，因为飞行员必须要体格健壮的人，但 Yadov 太瘦了。他换了科目，但还是保持着翱翔天际的梦想。他注册到列宁格勒大学的哲学系，荣誉毕业，继续攻读研究所。在 50 年代早期，他为其论文“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活动的形式”答辩，之后和 Igor Kon 见面之后，他转向了社会学。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也在后斯大林时代刚刚被解禁而已。

在那些日子里面，社会学并没有被苏联官方所认

>>

可，政府认为那是危险的科目，对于提供社会幸福手段的科学社群来说是个危害。Yadov 当他要做决策去研究俄罗斯历史的第一个经验研究时，因此在一个很不稳固的基础上。其主题很有挑战性：测试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看看新的苏维埃社会是否会产生新的“人”，就是一种新的个体，可以牺牲自己，成就全体。这个研究在 Man and His Work 这么书中被总结，标示了俄罗斯社会学的一大突破。

那时候，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在两极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其支持者歌颂新的系统是人类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其批评者则认为是“邪恶的帝国”，把人性黑暗面推到了极致。Yadov 显示了其苏联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并没有不同。苏联人想要俄罗斯变得繁荣，但是也重视私人领域，追求个人梦想与进步。从那时开始，Yadov 从未隐藏其对于本质论的强烈反对。他强烈反对所有试图要设计一个“本土社会学”的努力，就是那只能在国家边界之内形成的社会学。他认为没有 Kenyan 脚踏车，因为所有脚踏车都有共同点。他对于俄罗斯社会学的整合到世界社群这点来说，很强烈支持，把资源集结起来探索现代性。

Yadov 是唯一一个挑战苏联意识形态的学者。Igor Kon, Tatyana Zaslavskaya, Boris Grushin, Andrei Zdravomyslov, Vladimir Shubkin 等人都是这个推动诚信、自由讨论、开方社会的学者网络的成员。Yadov 坚持其传统，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了解社会变迁的方式。因此，他对于行动社会学和多典范的偏见似乎解释了这种持续的变化。

在 1988 年，Perestroika 让他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Yadov 和他的朋友，利用这个机会让社会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正当学门，开方社会学系所，让年轻研究生出国增进技巧，为社会带入新的观点。

后苏维埃有许多幻灭的希望和期待，但是 Yadov 仍然很乐观，终其一生。他会一直继续为俄国和国际的社会学社群奋斗。他勇敢克服弱点，继续旅行，保持沟通管道开放畅通。他继续送讯息给年轻人：我们社会学家必须是寻求了解和分享我们的了解。在 2015 年 7 月 2 日，Yadov 教授与世长辞了。那些认识他的人将会永远记得他的微笑、想法、以及他对于社会学的推动、承诺、与信念。■

來信寄給 Mikhail Chernysh
<mfche@yandex.ru>

> 学者与人本主义者

by Andrei Alekseev, St. Petersburg, 俄罗斯

在列宁像前讲话的Yadov。

6年前我才庆祝了Vladimir Alexandrovich的80岁生日，而他在2015年7月2日的时候过世了，享年87岁。人们或许会说："这是由于久病所导致。"可是，他临终前，其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绝对还有能力工作。

我们这个学科的整个的Yadov时代也结束了。他比同期的学者都活得久，其他俄罗斯的社会学先驱，像是Grushin, Levada, Zaslavskaya, Zdravomyslov, Shubkin，都比他早过世。此外，我也读过了许多的吊文和纪念文章，其中都围绕在他的专业生涯和国际知名度（然而，他从来却没有被选为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是因为政治的偏见）。个别的纪念文多数描述他的个性和其一生精彩的故事。

考虑Yadov对于学界和

>>

教育界的贡献，以及天赋和个人特质，这些追吊文是恰如其分的。Yadov 是个知识分子，这点毫无问题，但是他也是个知识分子阶级的一员。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但是 Yadov 却都代表了两者。

我想要着重在 Yadov 的特质上面，也就是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可以自由的跨界。例如，他的学术著作和生涯中，他总是想要把许多不同的典范结合在一起。其并非教条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 1960 年他是历史唯物论的奉行者，认为那是“普世的社会学理论”，可是他也为“个殊的社会学理论”的相对自主性辩护。他也不是实证主义者，虽然他出版了好几版的教科书“社会学研究的策略”可以清楚看到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

Yadov 把“多元典范”引介到俄罗斯社会学。他认为理论框架的选择是以经验为出发点的。他也有很宽广的社会学视野，所以，他的“社会行为的预测”，或许可以看成心理学，而非社会学。对他来说，学科边界并不存在。

Yadov 也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家。他有办法把复杂的学术材料用老妪能解的方式传播给大众理解，并也把真实生活带入学术象牙塔之中。他对于学术上的竞争者和敌人相当宽容，他也对批评者很宽恕。虽然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但是他的研究却很清楚地批判政府。

Yadov 很慷慨。我从来没有问他，也不认为他会有办法回答：他有多少“门徒”（那些他口试过的，或是批评过的，或是启发过得学生）。我猜有上百人。

我记得有一次，在科学委员会上，Yadov 意外地拒绝了一个年轻学者的论文，因为其作品风格太难懂了，像是“小鸟”在说话。这个拒绝是透过匿名投票产生的，而 Yadov 却帮该学生想办法，写了该学生想要表达的意思，让该有天赋的学生通过了答辩。

一个人的影响力是要看他对于近处和远处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从这观点来看，Yadov 的影响力涵盖整个学科，他不仅是先驱，还是创立者，后人难以超越。别无选择地，我们效法他，效法他对于学术、人、世界的贡献。■

來信寄給 Andrei Alekseev
<alexeev34@yandex.ru>

> 导师、同事、朋友

by Tatyana Protasenko, 社会学院,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St. Petersburg, 俄罗斯

享受俄罗斯乡下小屋生活的Yadov。

我第一次遇到Vladimir Alexandrovich Yadov是在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的哲学系教授会议上，那时候我是个速记员，还是学生。我记得那是1965年初，Vladimir Yadov刚从英国的学术训练结束回来，然后在系上做简报。这个简报是非正式的，也很有趣，让我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我申请并被接受进入哲学系，希望可以朝社会学专业迈进。那时的历史唯物论主导了整个学科。

虽然我是O.I. Skaratan的学生，Yadov是我的导师，同事，朋友，以及典范。后来他成为了我的上司，我们相处非常好。

真的，他是被神所爱戴的一位社会学家。他是一位愿意和任何人对话的公共社会学家，不论是否你是官员、甚至是总统，或是一般的受访者，他都愿意和你说话。他从不高傲，总是和同事在会议和聚会场合上谈笑风生。他也贡献给集体劳动，规律拜访国家农场Lensovetovski，那是他可以采花菜和萝卜的地方，那也是管理阶层不太做的事情。女性的农人都很喜欢Yadov，总是等他到来。而准将则会告诉他："教授，为什么你总是选那几种蔬菜啊？你需要把喂人和喂动物的区分开来呀。"Yadov则总是用笑话响应，然后会问有关于农民劳动条件、生活、家庭的问题。

我们一起经历了最困难和最黑暗的时期，可是他总是乐观以对，从不背叛任何人，并且帮助许多人。的确，他救了很多人。我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受到他的支持，是他建议我要去担任我们系上的党书记的职位，好保护系上不受攻击。毕竟，共产党是辩论和争论社会学最常见的公开空间。

同时，我们也没有停止做研究、调查，但是我们也喜欢读侦探小说。Yadov特别

>>

爱，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故事可以发展智力、逻辑思考、增进日常生活知识。在Yadov被开除后，Ludmila Nikolaevna（他老婆）或是他会来问我新的侦探小说。在那个时候，我的女性朋友都有私人藏书，包括了禁书与翻译。她们在国外有朋友，会把书偷偷运到俄罗斯。然后，打字最快的人则把新货拷贝一份。我仍然持有Samizdat的侦探小说。

Yadov最喜欢的歌叫做“我们都被葬在Narva的某个地方”，由Alexander Galitch着。我们每次聚会都会唱这首歌，并由吉他伴奏。Yadov总是爱唱这几句：

If Russia is calling for her dead sons it means it is in trouble

However, we see that it was a mistake - and what a waste

In the fields where our battalion was slaughtered in 1943 for nothing

Today the hunting party enjoys the killing and huntsmen blow their horns.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那特别的歌，他说：那是因为那首歌是关于牺牲者无意义的牺牲的故事，那些人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被牺牲了，那是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论战争或是承平时期。

我记得在社会经济研究院的50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呈上一桶红酒。他很高兴，要我们让他坐在酒桶上送他回家。“想象”，他说，“Ljuka（他老婆）打开门，然后看到我坐在酒桶上，什么其他人都没有的样子。”

我也记得他有一次从Budapest带来了防水的裤子给我6个月大的儿子。但是后来发现裤子太小了。他抱怨说：“你把你儿子喂得太大啦！”然而，他还是想把裤子换得刚好的size。那就是Yadov，非常人性、友善、理解、聪明。有时候他的想法的确很难理解，因为他总是把奇怪的事情兜在一起。

我个人对于Yadov最后的记忆是在2年以前。那时Oleg Bozkov和我拜访他在爱沙尼亚的家，Alexei Semenov则是Yadov最爱的之一，也是爱沙尼亚的长期居民，他开车载我们过去。Semenov计划要去竞选Tallinn的议员，其和妻子Larisa则对Yadov非常照顾。坦白说，那次是我生命中几次最高兴的时光之一，相聚一起时，我们一起回忆，一起谈笑风生，一起畅饮马丁尼和红酒。我们当然也讨论今日的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家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响应今日的挑战，特别是来自政府的限制。我们都会记得他生活的那一面，以及他对于人生与研究那种永不止息的兴趣。■

來信寄給 Tatyana Protasenko <tzprot@mail.ru>

> 个人回忆

by Valentina Uzunova，Kunstkamera，俄罗斯国家科学院，St. Petersburg，俄罗斯

在学院派对中的Yadov。

Vladimir Alexandrovich Yadov曾经在哲学系开设过一门课叫做“应用社会学研究”。他上课如此的专注以致于从讲台上摔下来过，因为黑板的长度比讲台还长，他写板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而导致。我们看了吓了一跳，可是Yadov马上回过来继续上课。这和年轻的、害怕意外的数学系教授多不一样啊，何况那些教授还应该要把黑板写满方程式吧。

Vladimir Alexandrovich在1967年聘用了我到社会系。我们透过书记员的纪录看到了他的博士答辩，不用说，那当然是很成功的。在历史系的大教室中对他的公开答辩充满了期待，特别是在Yadov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所充满的紧张气氛。这场答辩很难纪录，因为观众甚至用喊的去问问题。我感觉到了Yadov的愤怒，而他在高大讲台后面是看不见的。他试着照个规定要去念稿子，但是也要即席的去响应观众的批评和问题。

和其公开辩论的个性不同则是他谨慎小心的研究态度，这可以在他送给VAK （国家认证委员会)的一大迭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我们一起工作处理这些文件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在哲学系念书的前景为何。他相信未来是属于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因为这是最有趣的学科，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我则由衷相信他所言，对我的选择也不后悔。

接下来我要说一个在1970年发生的故事。列宁主义社会学家(共产青年联盟)不太支持共产主义办公室的决定要去移动我的两位同事和朋友。其中一位和外国人结婚，另外一个则随着家庭移民了。在纪录中，我们看到官方的建议并不被采纳。而我们集体的立场是“要迁徙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团结一致，也公开力挺，这惊动监视的官方单位。“他们太张扬了，这一定有人在背后撑腰。”他们这么觉得。结果就是我们有人惨了，要为这样的立场负责，而Yadov就是第一个被赶出去的人。这就是Yadov，从不跟自己的价值妥协。■

來信寄給Valentina Uzunova <ymnesterov@gmail.com>

> 苏联与后苏联时期的指标性人物

by Gevorg Poghosyan，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之哲学、社会学、法律学院院长，亚美尼亚社会学会会长，ISA迁徙（RC31）、灾难(RC39)研究委员会委员

有些学者的名字是和一些思想领域或是学科连结在一起的，而 Yadov 教授即是属于这种学者。他是一个苏联时代的先驱，大大形塑了苏联的社会学。自从 1960 年代，Yadove 的著作影响了亚美尼亚和苏联的好几世代的社会学家。他三个著名的作品分别是：Man and his Work (1967, 与 A.G. Zdravomyslov and V.P. Rozhin 合着)，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Program, Methods (1972) 和合着 Self-reg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Social Behavior (1979) 成为了苏联社会学家的重要参考。对于许多年轻学者来说，Yadov 的作品可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按照其最经典的著作来说，Yadove 成为了苏联社会学的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少数的亚美尼亚社会学家有幸可以和其对话，并且听他的课和演讲，甚至和其辩论或讨论研究。而这些人受其影响很大，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其中特别是他对于其研究和社会学的态度。他总是接纳他人，从不考虑年纪、学术地位、称谓、族群、或是意识形态。他也总是努力尊重他人的想法。其说过的一句话最让人印象深刻："真正的快乐来自理解了一件新的事物，并且与他人分享。"

当 Yadov 在 Leningrad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工作的时候，他试着去组织一群最有才华的社会学家。自由和批判性思考的氛围是其特色，这和苏联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单位很不一样。每一个受到这个氛围影响的人都会受到自由批判和创意思考的文化所吸引。Yadov 有特殊的个人魅力，也吸引了许多来自苏联各地的年轻的学者。他特别重视年轻学者的创意，并且对于权威知识坚持站在批判的角度。

会议中演讲的Yadove。

或许他自己从不知道他建立了一个广大的隐形学院，一个知识社群，或是一种"精神性的友谊连带"。这些是透过相似的世界观而来的。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其坚信社会学并需影响"社会星球的运行"，并且也在 Boris Doctorov 的最后一次访问中强调了这点。Yadov 的著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说："若我们社会学家把自己局限在写作上，我们是没有履行我们的公民义务的。"这个想法可以称之为 Yadov 的最后的遗嘱吧。我们亚美尼亚社会学家会永远怀念他的。■

來信寄給 Gevorg Poghosyan <Gevorg@sci.am>